

■ 红星照耀中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1934年9月下旬，地下党得到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计划。项与年把情报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连夜从德安起程。他敲掉四颗门牙，面孔立时肿胀，浑身肮脏不堪，一副乞丐模样。10月初，闯过重重关卡，项与年终于跑到瑞金的红军司令部，将情报交给周恩来。10月16日晚，中央红军开始渡过于都河……

# 与共和国一起，踏上征途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刘一颖



叶坪黄墙上的宣传口号。



叶坪列宁台。

号，岁月的脚步清晰可见，时光亦格外留恋地静止了。

在这座老房子里，刘淑芬老人盼着长征的丈夫归来盼了62年。“我外婆没有再嫁，一直一个人，一辈子都是一个人啊！”刘淑芬的侄子、现住宅子中的刘光沛感慨道，“我外婆不仅把丈夫‘捐’给了红军，还把家里所有的门板、床板都贡献出去作为当时渡河的桥梁板。有的认领回来了，大多数的（门板）为了阻截国民党追击就都被烧掉了。所以家里很多门板是后来安的，有的门板尺寸不合，有的门板就没安。”

## 依依惜别，踏上征途

于都河上，除了5个搭设浮桥的渡口外，其他的3个渡口需靠船工摆渡过河。

1934年10月17日下午，李声仁和族人正在于都河石尾渡口打鱼，突然来了几名身着军装的士兵召唤他们靠岸，并请求他们晚上出船帮忙把红军送到河对岸去。

渔船靠岸后，18岁的李声仁听到是“打地主、分田地”的红军，立马从船上跳上岸，紧握着士兵的手问好，并代表同来的20多名船工接下了这份差事。当天晚上，李声仁和未婚妻一起摇着船，联合河上20多户渔民一起来回运送红军过河。因为船太小，每趟只能运10人，李声仁和未婚妻奋力划船，送完一批，又连忙返回送第二批，直到把石尾渡口的3000多名红军全部送过河。

为了不让巡查的敌机察觉到异常，第二天天亮后，彻夜奋战的李声仁等船工放弃休息，继续摇着渔船在河中撒网打鱼。到了晚上，李声仁又联合20多位船工撑着渔船来到于都河鲤鱼塘渡口，护送后方红军3000多人过河。为防止被敌人发现，船工们不打渔火，不打暗号，全靠经验来把船划到目的地，避开河中的险情，船工们的手上磨起了许多血泡。

知道红军要走了，于都百姓组织了大批慰劳队，带上鸡蛋、猪肉等慰问品，热情慰问红军指战员。妇女们聚在一起，把她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还有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亲人。

“黄昏，当夕阳的余晖投射到碧波涟漪的于都河上时，我们列队从这里出发了。虽然这次战略转移，由于时间的仓促，除各部队传达动员外，已经没有时间和群众开告别会，但是根据地的群众凭借着多年来的战斗经验，还是从我们的行动上感觉出来了。他们悄悄地作了准备，不约而同地聚拢来了。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场面。”杨成武将军在《别了，于都河》一文中这样写道。

“乡亲们有的把煮熟了的鸡蛋塞到我们的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进我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忍不住地呜呜哭了起来。”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正在和一营的几个干部谈着事，突然，他看到人群中钻出了他的房东大娘。

“房东大娘今年六十多了，一头白发，他3个儿子都当了红军，两个牺牲了，一个当了干部，显然，她看完儿子，又到我这里来了。”大娘把用一块小白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杨成武。她打开一看，是两个热气腾腾的红薯。

手里捏着红薯，杨成武眼睛湿润了。“在苏区连续遭到破坏，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大娘捧出两个红薯来，真是捧出了大娘的一片心啊。”杨成武难以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捧着红薯，他又深情地叫了一声：“大娘！”

与后来红军所强渡的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相比，于都河算不上凶险，但因为有了苏区人民的深情惜别和殷殷期盼，在红军将士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府所属机关的干部会合，和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一起从东门渡口渡过了于都河，汇入到那支辽阔的红军队伍里，融入苍茫夜色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队伍中的红军官兵谁也无法预料，他们同整个国家一起，踏上了征途。



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在叶坪的合影。（资料片）



于都河畔东门渡口。

政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

然而，红军的高级将领们还是感受到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根据中革军委的撤退计划，中央红军扩大为5个军团，由12个师和2个纵队的非战斗人员组成。在反“围剿”中损失严重的红军急需补充兵力，“扩红”突击运动在1934年5月席卷中央苏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发表的“五一”劳动宣言中，号召每一个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加入到红军中去。5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的《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宣言中，提出5、6、7三个月，中央苏区要扩大红军5万人。

“号召一出，苏区人民热烈响应。瑞金县在一个月之内，就扩大红军5400人，超额30%完成任务，成为扩红突击模范县。”瑞金市委党史办干部毛瑞明介绍，据统计，瑞金当年24万人，有11.3万人参加革命，青壮年参军参战，年幼的参加儿童团，妇女参加洗衣队；有5万多人参加革命，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瑞金留下姓名的烈士达17166名。

“父送子，妻送郎，父子一同上战场”的情景，在瑞金比比皆是。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农民杨显荣，在五次反“围剿”期间，先后将8个儿子全部送上了前线，后来都牺牲在反“围剿”的战场上。“八子参军”的感人故事，登上了1934年5月30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有“共和国第一军嫂”之称的陈发姑，与丈夫朱吉董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为了支持身为家中独子的丈夫参军，她一人承揽了全部家庭重担，把丈夫送进了区政府报名参军。除了照顾家里，她自己也参加了苏区的妇女工作队，成为村里的一名妇孺干部。积极组织村里的姐妹们筹款筹粮，为红军战士缝制军衣、打草鞋、洗衣服；到红军医院里帮助照顾伤病员、送饭。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陈发姑也自此开始了长达75年的旷世等待。解放后，政府调查认为她的丈夫在长征途中牺牲了，但她始终坚信丈夫没有死，逢人便讲：“我丈夫参军出去了，我一年盼一年，一月盼一月，一天盼一天，很希望我丈夫回来跟我们团聚。”陈发姑年年都要编织一双草鞋，寄托对丈夫的思念，即便双目失明也不间断。直到2008年，115岁的陈发姑在睡梦中安然辞世。

1934年9月，中央组织部、总动员武装部等发出了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扩红”运动的数量达到了高潮。但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兵源已越来越少。自1933年以来，已有17万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15个人就有一人参加了红军。

曾动员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毛泽东，此时正在于都视察，因患疟疾备受折磨。扩红干部找到他，请他帮忙动员群众。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只讲了5分钟，表达

了一个意思：决心。这两个字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大规模的“扩红”努力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人数达8.6万人，其中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战士。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扩红”的同时，借谷筹款运动也在中央苏区大规模展开。7月，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老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他们将粮食一担担地挑进了红军的粮库，圆满完成了60万担的借谷任务。

据考证统计，在创建、保卫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瑞金人民购买公债77.3万元，支援谷子25万担，捐献战争费用22万元，捐献银器22万两，奉献苏维埃银行瑞金支行存款2600万元，其他捐赠如草鞋、棉被、衣物、菜干等因史料数据繁杂庞大，难以统计。按当年的购买力对比统计，经济物资的奉献约合人民币78亿元。

苏区人民对于红军的支持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刘良分析说，“红军没有来之前，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备受剥削压迫。红军来了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让他们翻身成了主人。”“人民代表大会”“无产阶级革命”等新奇的名词，则让他们感受到了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从而萌发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集体意识。

## 向西，进发

1934年10月10日夜，月色朦胧。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军委第一纵队，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的军委第二纵队，一步步远离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红色瑞金。

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向西，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进发。突围的方向，定在南线与粤军防线交界的中央苏区西南角。

此去西行，并非是无把握地硬闯。10月6日，中央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军事代表，与时任国民党江西“剿匪”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代表，在江西寻乌县罗塘镇举行秘密谈判，为红军向西突围创造了条件。

陈济棠当时主政广东，虽率军驻守在江西省会南昌井冈山地区，却希望偏安广东地盘，安稳地当他的“南天王”。他曾三次通电反蒋，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之效。

罗塘谈判如期进行，三天三夜的会谈最后达成了“停战借道”协议，陈济棠部采取“送客”政策，减轻红军伤亡。

在这场举国大转移开始前，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捆扎起来搬走。兵工厂、服装厂、印刷厂、医院等部门中的织布机、缝

纫机、铅印机、石印机、印币机，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甚至野战医院病号的尿盆、机关办公室的桌椅和文件柜都已捆扎好等待搬运，远远超出了负荷。重新压缩精简后，还是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物资。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已有四十多斤，再挑上五六十斤的担子，长途行军的难度可想而知。

1932年参加红军的谢宝金是于都县岭背镇谢屋村人，1.89米的大个头儿，力气很大，年轻时据说能挑150公斤重的东西。参加红军后，谢宝金被选到中革军委情报部技术股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和战友一起管理、使用军委发报用的发电机。那台发电机很重，近70公斤，又是手摇的，只有谢宝金能对付它。

中革军委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前，首长对谢宝金说，这些设备是中革军委的“耳朵”和“眼睛”，大家要用命来保护它。当时，中革军委仅有一台发报机和发电机，中央派了一个128人的加强连保护这些设备。开始是8个人轮流抬它走，可长征一路打仗，连队减员越来越多，抬发报机的人也越来越少。谢宝金见战友一个个倒下，眼睛红了：“就是剩下我一人，也要背着它走到底！”就这样，谢宝金一个人背着它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走到了延安。

## “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从瑞金到于都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如今坐动车翻山越岭，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小城市宁静富足，波澜不惊的于都河缓缓流淌，涵养着这片土地。

向着于都，中央红军主力集结而来，等候着出发的最后指令。

1934年10月15日上午，在于都县郊外的谢家祠堂里，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容憔悴。此刻，他内心的创痛太过痛痛的折磨。面对两百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他沉闷地吸着烟。

这是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他缓慢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最后这句话毛泽东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这句话是真心话。而这句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隆新田打胜仗。”10月16日晚，集结休整完毕的中央红军，开始渡河。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长征歌》中的第一首，正是当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漫漫征途的真实写照。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红军渡河出发的情景被做成了主题雕塑，雕塑背面主题为“依依惜别”，表现的是于都人民送别红军的依依深情。

纪念馆中，“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高高矗立，碑身的双帆造型，寓意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82年前的10月18日，中央红军机关就是从旁边的东门渡口渡过了于都河，踏上了万里长征路。

“于都河其实就是贡江，但当地人习惯把于都境内这一段称为于都河。”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在东门渡口旁介绍，根据当时任总部工兵营营长的王耀南回忆，当时于都河宽600多米，水深1到3米，最大流速每秒1.2米，河底为沙石。这样，大部队要迅速过河就得架设浮桥。

架桥要用木船当桥脚，杉杆当桥桁，上铺木板。在中共赣南省委领导下，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大力支援红军，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运，共调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于摆渡指挥部队渡河。依据命令，为了防止敌机侦察，过早暴露目标和红军行动意图，要求架设浮桥都在傍晚5点后进行。在红军渡河的4天时间里，每到傍晚，有组织的群众纷纷走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送水送饭，还有的直接参加架桥。红军渡河后，要在次日早上7点前把浮桥拆除，傍晚5点后又重新架桥。据统计，在于都县30公里的河段上浮桥被架设了15次，这样既保证了红军渡河，又隐蔽了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图。

“为了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河两岸的于都人民把家中所有可用材料都贡献出来了，有群众还拆下了门板和床板。有位年逾古稀的曾大爷，在将家中全部材料献完后，又亲自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架桥工地。”张小平说，时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指挥架桥材料的征集工作，得知此事后，他感慨道：“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在于都县建国路20号后门，有一座被于都县政府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刘次垣民居。不同于东边惠民楼小区的热闹喧嚣，这所建成的清代的赣南民居静谧幽深。经过时光的洗礼，房子的围墙墙落了外砌的黄土，露出水色的石砖。走进庭院，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水腥味，灰色的石板上长着青色的苔藓，天井投入的光亮为房间带了微光，半掩着的门板残缺不齐，墙壁上留存着“巩固于都政权”的口

## 转移，迫在眉睫

从济南赴瑞金采访，交通并不顺畅。现代化交通工具不断转换，抵达瑞金时，夜幕悄然而至。瑞金的夜没有流光溢彩，静谧而安详。撑着各色大伞的“摩的”漫不经心地街头巷尾候客，随后也成为记者在瑞金采访期间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瑞金位于闽、赣、粤三省交界处，偏僻但富饶，自古就有“绵江两岸是块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之说。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成为共产党人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瑞金也因此被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也自此有了“毛主席”这个称呼。

走进瑞金城东3公里处的叶坪乡叶坪村，芳草如茵，古樟参天。临时中央政府旧址、苏区中央局旧址、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国家银行旧址……毛泽东旧居、烈士纪念馆、烈士纪念碑等等，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墙上的标语、屋顶的红星，营造出浓厚的红色氛围。

在这里，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印发货币，颁布宪法、劳动法等法律，发展苏区经济、创办社会事业，指挥全国苏区工作。“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执政尝试，九部一局的架构是共和国国家机构设置的雏形。党在中央苏区的实践，为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刘良告诉记者。

然而，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疯狂“围剿”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难得安生。1933年4月，毛泽东随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迁往瑞金城西的沙洲坝。

1933年夏，国民党调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敌我力量悬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及军事决策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红军的反击连连受挫，伤亡惨重。

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门户广昌失守。7月初，国民党军31个师向苏区的中心发起全面进攻，瑞金开始遭到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随后，苏区的党政军机关迁到了瑞金以西20公里外的云石山梅坑，领导人分散住在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孤独地住在山顶的云山古寺里，伴随着的是妻子贺子珍和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一个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计划：在一个月之内把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缩小至瑞金，从四面构筑成一道以碉堡、铁丝网为主的封锁线。届时，将在瑞金周围架起三十道铁丝网、数十道火力封锁线。为防止红军突围，还将配备1000多辆卡车，快速运送国民党部队，以便机动地及时拦截红军。

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深感事关重大，冒着巨大的风险，安排在他司令部里工作的中共特科情报员项与年，把蒋介石的进攻计划交给中共中央。

项与年即将情报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连夜从德安起程。为了安全，他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冒充乞丐，面孔肿胀，肮脏不堪。10月初，闯过了几十道国民党军设置的关卡后，项与年终于跑到瑞金的红军司令部，将情报交给了周恩来。

10月6日，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格外令人焦虑：国民党军已经全面突破石城防线，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

## 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

国民党军步步进逼，战略大转移迫在眉睫。此时的瑞金却一如过去那般安静从容，稻谷金黄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景象。

也有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李德所住的“独立房子”寂静了不少。李德喜欢吃鸭子，房子周围总是养着大群的鸭子，可如今，鸭子越来越少，领导们的会议越来越多了。

其实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战略大转移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领导下秘密展开，准备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进行战略大转移。在李德看来，战略大转移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因此，当时关于战略大转移的传达范围，只限于